

# 张茂龙:在文学行走中发现传奇

20世纪80年代末,报告文学《黑户》面世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992年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辞典》将它收入其中。

作者张茂龙当年只有二十岁出头,他不会想到,与那对“黑户”夫妻的偶遇,竟改变了他的人生。自此,张茂龙将报告文学创作视为一生的文学追求。

坚持走一条路,需要勇气。尤其在今天全媒体传播语境和非虚构视野之下,报告文学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张茂龙走得很执着,他坚信报告文学独特的价值所在,始终在行走,始终在思考,始终在写作。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凡 姜斯佳/文  
牛华新/摄



作家张茂龙

1

“只要心里有向往文学的种子,再贫瘠的环境也能生根发芽。”打小,张茂龙就认定了这一点。

张茂龙的童年跟随下放的父母在盱眙农村度过,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生存状态下,文学是他几乎唯一的精神寄托。渐渐地,张茂龙养成了读故事、讲故事的爱好,每天放学后教室门口都会有一群孩子在等他,就为了跟他一起走回家,在放学路上听故事。

张茂龙最初的创作,是给县文化馆编写话剧、相声、黄梅戏。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茂龙在盱眙参军入伍,从事部队新闻报道工作,他学会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也逐渐通过阅读尼采、弗洛伊德的哲学书籍,开始更深层次地思考,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和价值。如今看来,早期的创作经历都在为他最终成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铺平道路。颇具转折意义的,是198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黑土》。

在题记中,张茂龙写道:“我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真名,一个是笔名也是假名,真名用来写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假名用来创作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但是,我用真名写出来的有的是假的,我用假名写出来的往往都是真的。”

《黑土》讲述了作家宣传一个“假典型”酿成的悲剧。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部队荣誉,“我”为一位并不出色的战士虚构了事迹,当战士被破格提干,部队各级领导纷纷提升,“我”也为此出名。一位姑娘爱上了报纸上的“先进典型”,但她的结局却是在待产时被去北京领奖的“先进典型”抛下,最终因难产去世……

“过去我对文学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后来我才知道文学是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体现。通过《黑土》的故事,我懂得了文学应该真正表达什么。”张茂龙说。

此后,他相继出版了《黑屋》以及批判80年代拜金主义的《黑店》,充满批判反思色彩的“黑系列”让张茂龙在文学界小有名气。不过,因为“黑系列”,张茂龙也尝到了被疏远和孤立的滋味。

2

《黑户》的出版,改变了张茂龙的命运。

那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张茂龙去金华途中的一次偶遇。他经过了一座破庙,看到庙里有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带着一群牙牙学语的幼童,一问才知,这些孩子竟然都是捡来的。他们生活得这么贫穷,为什么还捡孩子?

张茂龙开始频繁拜访这家人。最初,老两口有所顾忌,虽然脸上挂着微笑,嘴上说着感谢,但总是畏畏缩缩。当张茂龙陪着老头子喝酒,一口喝下老太太用一口破碗从庙门口稻田舀上来的水时,老两口这才渐渐敞开心扉,“那时候他们的笑才是真实的。”

“这一家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一般人见到他们都会捂着鼻子走,但他们有他们的快乐,不比别人差。他们捡破烂,有时候捡到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卖了两个钱,老爷子还会买二两黄酒喝。你看那些孩子脏兮兮、破衣烂衫地住在破庙里,但他们晴天也会放风筝,捡到好吃的还会互相谦让。他们都能生活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更让张茂龙震动的是,这些“黑户”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会把街头的弃婴捡回去养。“他们没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更多出自原始的人性——破鞋子,烂苹果都要捡回来,一个生命能不捡吗?你问他们怎么养活,他们会说,养不大就养小点,养不胖就养瘦点。”

张茂龙据此写了报告文学《黑户》,作品发表后,引起了全社会关于人性与道德的思考,也引发了对户籍政策的探讨和争议。当时《黑户》在《南京日报》连载,每天都能收到一两麻袋给“五里亭黑户”的信;很多人每天下午4点就在报刊亭前排队,只为了尽快看到“黑户”生活的最新发展;甚至还有想要孩子的人找过来;张茂龙出差到南京,公交车上谈论“黑户”的声音不绝于耳……作品的热度给张茂龙和“黑户”一家带来了种种酸甜苦辣,最红的时候,“黑户”曾与张

茂龙一起,被邀请参加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潮”大型主题晚会,在《爱的奉献》的音乐声中,“黑户”登台亮相,观众们全体起立,向这个卑微的家庭表达敬意,像今天追星一样关注着他们。

“黑户”最终被政府妥善安置,因一部文学作品改变了命运,而此时的张茂龙也意识到了报告文学强大的穿透力:“报告文学是利剑、是匕首,也是旗帜。”从写戏剧、小品到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他自此将报告文学确立为自己终身的创作方向。在《黑户》之后,张茂龙又接续创作了《黑户悲喜录》《黑户备忘录》,揭示众生百态。

3

这些年来,张茂龙一直深耕报告文学,笔耕不辍。他创作的《正义之光》《第二张脸》《好人周光裕》《死罪难逃》《平安卫士》等作品,弘扬正义,揭露丑恶,充满人性的光辉。

在张茂龙看来,报告文学有两个重大作用:“一是揭露和批判,二是歌颂,这两个重大作用是新闻和小说无法替代的。歌颂与批判并不矛盾,二者相辅相成。歌颂是必要的,就像小孩子需要鼓励教育一样,社会也需要鼓励和正向引导。”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张茂龙深知,歌颂不是吹捧,必须是一种深刻的真实的歌颂。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只有扎实地采访,才能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才能发现日常中的传奇,表象中的深蕴。

“我写的,一定是感动我的,不能让我感动的东西,我不会昧着良心去写。”这是张茂龙撰写歌颂之作时的准则,他有时会调侃和警示自己:“过去写黑的,心是红的;后来写红的,心不能黑了。”

最近,张茂龙的新作《永远的初心:一个共产党人的灵魂能走多远》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也许看到书名读者可能会预设这部作品严肃沉闷,但如果读下去,会发现内容充实、丰富,读来踏实、畅快。村支书郭克生始终铭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人初心,认准“只要做的是有益于百姓的事就不会有错”,一条路走到底,带领村民们一步一步脱贫致富的过程,不亚于大热的电视剧《山海情》,书中充满了真实感人的细节。

张茂龙写作这本书,是从得知一位75岁的村民不辞劳苦骑着三轮车,两度到扬中市找媒体,拿出自己连写带画的满满七页纸,拜托媒体宣传已经去世的村支书郭克生开始的。张茂龙很好奇,是怎样的一个人会让一位村民在他去世后为他奔走?

写报告文学这么多年,张茂龙很清楚“行走”对于创作的价值。他说,只有行走,才能发现故事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报告文学被称为“行走文学”的原因。

在2019年到2021年间,张茂龙十次走访扬中市新坝镇联合村,采访了120多人,走访1000多户人家。老百姓们提起这位郭支书,无不肃然起敬,许多人都是抹泪讲述。张茂龙饱含热泪完成了采写,并对他笔下所写的每一个事实负责,“郭克生这位普通的基层干部用行动证明了共产党员的初心绝非一句虚言。我在歌颂郭克生的同时也在反思:其他人在崇尚什么,追求什么?”

“前些年我也有一段时间对报告文学创作有点悲观,现在畅销书、网络文学的市场价值比较高,而写报告文学的好多人都在坐冷板凳,尤其是这种道义和正义的东西,现在谁有时间会阅读呢?”张茂龙坦言,他也曾经走过一些弯路,但最终还是没有偏离方向,因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为时代发声的情怀改变不了。

## ■对话

### 非虚构无法替代报告文学

读品: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非虚构是对报告文学的某种替代。但换一个角度,也正是因为近年来非虚构的兴起,报告文学也被给予了更多关注。你怎么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张茂龙:“非虚构”这个提法是带有学术性的,是在纯文学的视野下提出的,在非虚构视野下探讨报告文学,可能是想让报告文学离文学更近一点。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不能完全混为一谈。所谓的非虚构文学,其实带有更多虚构的成分;而报告文学可以刻画、塑造,但不能虚构。非虚构是介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的,它无法替代报告文学。在当下这个时代,我认为报告文学不但会很久,而且会越来越旺盛,因为社会需要它,时代需要它,人民需要它。

读品:大众对报告文学容易存有一种偏见,以为就是讴歌和颂扬,你怎么看?

张茂龙:这个不怪读者。报告文学有时候会被一些急功近利的和好大喜功的人利用,他们所谓的“报告文学”实际上是“吹捧文学”“广告文学”,很多人会出高价让人写“报告文学”。现在每年有大量的报告文学出现,也会开很多研讨会,有的会开完了,这个书就被放到仓库里,没有人读。我认为书是有生命的,读者在读,这部书才有生命,才有价值。

读品:我看到一种评价,说报告文学塑造人物是不容易的,就像走钢丝一样,其实很难拿捏。你在人物塑造方面有什么心得?

张茂龙: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存在于生活本身之中,存在于人物的故事之中。很多人写人物很虚、很飘,因为他没有完全理解。写人物要认识到他的价值到底呈现在哪里,还有表达的准确性。我坚决反对那种随意的吹捧和拔高,要真这样这个人物就死掉了。你要挖掘他身上普通的、平凡的,但却是最美好、最伟大的那些东西。

读品:你觉得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茂龙: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身上,是有使命感的。良心和正直是一个报告文学家必须具备的,否则他的作品不会有力量。

读品: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张茂龙:有一个题材是想了很久的,现在国家也在关注,就是教育这块,不是课本教育,而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教育。我一直在想,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崇尚什么,追求什么?市场经济发展了经济,但确实对人的三观冲击很大。一个社会如果以金钱、权力为价值取向的话,这个社会的发展一定是畸形的,一定无法长远发展。现在的少男少女在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受环境影响很大,这方面的悲剧很多,我收集了很多素材,采访量也很大,我正在着手准备。